

史學與政治：中共的歷史「興趣」

侯坤宏 前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一、前言

1949年中共建國後，有一批歷史學家積極用馬列主義書寫新歷史，其中包括范文瀾、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吳晗、尹達、黎澍、劉大年、胡繩等人。（註1）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學者，他們的學術專業，往往涉及並依賴於認同形成的整個過程，也因為這樣，無論歷史學家們是否有意識，「政治」都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起著重大的作用。（註2）

中共極重視歷史論述，他們相信只要能控制歷史論述，就能控制現在與未來，因為型塑現在與未來的，就是人們對自身歷史的理解。（註3）中共統治下，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任何工作都是以「政治」為優先，研究歷史（「史學」）也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當今的現實。（註4）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批判（詳下文）給中國史學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後果，因它扭曲了「史學」與「政治」的關係，扭曲了歷史學的學術本質，使「史學」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完全依附於政治，完全政治化，徹底喪失了獨立性，喪失了自身。（註5）關於「政治」，法國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雷蒙·艾宏（Raymond Aron）說：「搞政治思想，需要儘可能的理性；但搞政治，那就必須要利用他人的激情。所以政治活動必然不純正。」因為任何政權均可能以崇高理想之名，做出極野蠻的事。（註6）

文革前後的中國，歷史學領域是極左思想的「重災區」，（註7）在新中國學術史上，史學批判是一個沉重的、特殊的、敏感的話題，也是研究當代中國史學不可迴避的課題。因為檢討自身的歷史（含1949年以後的中國，以及中共統治下的史學與史學家），是史學的本職之一，（註8）當代歷史研究者應該正視之。

極權統治有時候可能是歷史的大敵，他們精心地、系統地篡改歷史，用謊言淹沒歷史，這也說明了極權統治者十分重視歷史。（註9）成熟的歷史，不僅應當記下本國或本民族的成就與榮耀，也要記下失誤與教訓，雖然它令人不快（安），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不能僅是歌功誦德。（註10）「歷史」與「政治」有其不同目的，「政治」關心社群內部的權力分配，「歷史」探究往昔的真相，「歷史」絕不能依附於「政治」，（註11）但在現實世界中，這種想法可能只是一種奢望。

作為一種行為意願，歷史書寫自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 1469-1527）時代以來，便一直受到政權的左右，換句話說，就是——政治規訓著歷史書寫。（註12）研究歷史的社會功能是什麼？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功能是什麼？其中可能隱含有一套引以為據的教條，被稱為「權威」。（註13）歷史學把權力作為寫作對象，歷史學與權力結為一體，（註14）過去中共的歷史學，就有這方面的傾向。本文旨在研究中共統治下的「史

學」與「政治」。以下就從：透過歷史以進行政治鬥爭、歷史學者的悲慘命運、毛澤東的角色問題等方面談起。

二、透過歷史以進行政治鬥爭

以研究歷史為業，以給整個社會和人生總結經驗教訓為使命的歷史學家，自己卻固執地不接受那些血淋淋的歷史教訓，而且還在不斷地為這些歷史教訓增添新的悲壯篇章。試問，還有比這更撼人心魄的悲劇麼？（註15）

中共自1949年建國之後，常透過歷史來進行政治運動，歷史成為政治的工具；由於強大政治壓力，加上對共產黨理念的認同，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也配合不同的政治需要進行研究。上文引自王學典〈翦伯贊——前「文革」時期史學界理論探索的先驅〉一文，翦伯贊是中共著名的歷史學者，因政治運動「被」提早結束生命。

2014年初，杜學霞出版了《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一書，書中指稱，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政治跌宕起伏，運動接連不斷，社會處於急劇變革中，中共史學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此過程中，一波接一波的史學批判成為中共史學發展史上特有的現象，表面上是「團結、建設、繼承、改造」，實際上卻是「鬥爭、破壞、打倒、清洗」，充滿政治色

彩。由於政治、社會以及學術的不成熟，當時所謂的「史學批判」在195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脫離正軌，滑向政治化歧途，最終發展成為一場狂熱的政治風暴，史學也淹沒在大批判中。（註16）

史學批判是一場運動，一種手段，一項任務，同時又是史學存在的一種特殊形式、一種變形。當時中共史學大體可分為三區塊：一是各項專門史學研究；二是以「五朵金花」為代表的史學論辯；三是史學批判及大量的批判文章。（註17）史學批判與「史學革命」密不可分。中共建國以後，將民國以來實證主義史學，逐漸改造成馬克思主義史學。在1958年「厚今薄古」大辯論中，「史學革命」被正式提出，它強調通過「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打倒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舊史學體系，確立以農民鬥爭為中心的新史學。1961-1962年，在歷史主義思潮反擊下，此種風潮暫時有所收斂；但隨著左傾政治的發展，「史學革命」再次以一系列史學批判的形式闖進史學界。文革前後，還打著「大破大立」旗號，揮舞批判大棒，在學術界大開殺戒，「革」史學之命。（註18）

《歷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國歷史問題委員會」倡議創辦的歷史學專業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創刊。毛澤東就創辦此刊物，提出以「百家爭鳴」為方針研究歷史。郭沫若直接領導編委會和編輯部的組建工作，第一屆編委會成員有郭沫若、尹達、白壽彝、

向達、呂振羽、杜國庠、吳晗、季羨林、侯外廬、胡繩、范文瀾、陳垣、陳寅恪、夏鼐、嵇文甫、湯用彤、劉大年、翦伯贊，歷任主編有尹達、黎澍、龐樸、徐宗勉、田居儉、宋德金、李新達、張亦工等。（註19）

《歷史研究》是中共史學界的重要刊物，創辦之初，就接受毛澤東指導，就此可言，「歷史」完全聽命於「政治」。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1,279人出席，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次會議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此時中共高層對知識分子的工人階級屬性，尚未達成共識。同年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仍把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註20）與前幾年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相比，1956年的中共政治處於一種比較寬鬆的氣氛中。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後，毛澤東提出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又提出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前者動員知識界解除顧慮，加入到學術爭鳴中；後者鼓動民主黨派參與政治，允許媒體報導批評言論和爭鳴文章。中共的政治一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氣氛。（註21）

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發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指出「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自此之後，在全中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註22）反右運動在20世紀後50年代中共歷史發展鏈條中，是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它往上承續反胡風、肅反運動，往下與三年大災荒、文化大革命，以至「六四事件」都有深刻的內在聯繫。或許因為如此，反右運動就與三年大災荒、文化大革命，一起成為被強制遺忘的禁區，成了「歷史的死結」。（註23）

1959年4月2-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毛澤東針對當時「大躍進」以來黨內很多人謹小慎微、隨波逐流，不敢講真話的現象，號召大家學習海瑞，要有像海瑞批評嘉靖皇帝那樣的勇氣，堅持真理，不要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毛鼓勵歷史學家們，應該好好研究海瑞。他號召大家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不怕丟官、不怕坐牢的精神。會後，毛澤東的秘書、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找到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他根據毛澤東的意思，為《人民日報》寫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吳欣然接受。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用「劉勉之」為筆名寫的

〈海瑞罵皇帝〉一文，頗得史學界好評。從9月17日開始，吳晗在《人民日報》又陸續發表了論海瑞等5篇文章。（註24）1962年以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毛澤東關於「防修反修」的思想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並逐漸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此同時，一場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策劃的政治大批判也正等待時機，積蓄能量。到1965年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出籠，拉開了全面批判歷史學者吳晗、翦伯贊的序幕。隨後，這場預謀的大批判在整個思想文化界迅速蔓延開來，很快演變成一場「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破除一切」的史學大批判，並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在這場風暴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極左」口號和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瘋狂舉動，使一大批史學家橫遭迫害，使中共史學遭到滅頂之災。這表明，從1950年代批判《武訓傳》開始發展起來的史學批判已完全政治化，墮落成政治鬥爭的工具。（註25）

1971-1972年間，中共又掀起「批林批孔」和鼓吹「儒法鬥爭」，對於古代史的研究者，特別是春秋、戰國史的研究者，帶來了極大麻煩。這是一個藉批判古代哲學思想和討論古代思想界為名，所發動的一場政治鬥爭。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這個論題還是一種政治鬥爭的重要手段。從1973年

9月起，「批孔」和鼓吹「儒法鬥爭」的浪潮更是高漲。北京和上海兩地出現了3個使用筆名作為批判權威的御用寫作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是梁效，梁效是「兩校」的同音字。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筆名是「羅思鼎」，羅思鼎是「螺絲釘」的同音字。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的筆名是「唐曉文」，唐曉文是「黨校文」的同音字。這些御用寫作組一時被吹捧為批判的權威，他們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政治意圖，借用「批孔」和鼓吹「儒法鬥爭」手法，寫成了許多文章，以作為政治鬥爭的籌碼，這都是對歷史的一種濫用。（註26）

三、歷史學者的悲慘命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說：

我們指責史學家誇張、扭曲、無知、偏見，或違背事實，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史料加以選擇、比較，並依照脈絡與秩序來排比史料，而這些脈絡與秩序，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另有一部分則受到他們的物質與社會環境，以及他們自己的性格與目的所限制。我們並不因此而指責史學家。我們只有當他們的研究結果離譜太遠，與他們自己那時代、地方，及社會公認的檢證和詮釋典範相差太鉅

之時，才會指責他們。（註27）

以賽亞·伯林是英國政治思想史家，20世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歷史學家「只有當他們的研究結果離譜太遠，與他們自己那時代、地方，及社會公認的檢證和詮釋典範相差太鉅之時，才會指責他們」，依此標準來看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學家，我們要怎樣來衡量他們呢？

作為一個悲慘時代的親歷者，陳旭麓（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建校元勳之一，1918-1988）曾以「大史震」一詞，來比喻文革給他們那一代學人所造成的心靈痛楚和精神震撼，此種痛楚和震撼比唐山大地震來的劇烈。（註28）隨著政治運動逐漸激烈，到文革前夕，大批歷史學者被打倒，所有正常的學術活動陷於停頓，各種研究機構及各高校歷史系也陷入癱瘓狀態。在大批判運動衝擊下，各種學術刊物都亂了陣腳。出版方面，除了兩報社論，就是清一色的聲討、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論調。1966年下半年，《歷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教學》、《文史哲》等也被迫停刊。至此，真正的史學已經被淹沒在大批判狂潮中。（註29）

文化大革命是以兩顆著名歷史學家的頭顱，被拿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祭旗犧牲品。如果說，姚文元用的是吳晗的頭，那麼戚本禹用的是翦伯贊的頭。（註30）文化大革命是從歷史學界打開缺口的，1961年1月

9日，吳晗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北京文藝》刊出。(註31)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拉開了10年浩劫的序幕。(註32)1966年4月4日，顧頡剛日記中記說：

吳晗平時作文，主張古為今用，假古諷今，藉古事給今人以教育，獨於去年姚文元評其《海瑞罷官》劇本後則說編劇時為古而古，為編劇而編劇，邏輯混亂，假話破露，戚本禹對之作無情的批判，諒彼亦無以狡辯也。(註33)

我們很難想像何以同為知名歷史學者的顧頡剛，竟對吳晗作出如此的評斷。其實吳晗寫《海瑞罷官》，原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註34)是為了「緊跟」，雖然最終還是沒能跟得上；(註35)1969年10月11日，吳晗受迫害致死。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當政者的意圖，讓「海瑞」這具政治僵屍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自己的親人相繼喪命，(註36)吳晗果真成為一個「歷史的俘虜」。(註37)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此文以「造反有理」為中心思想，以毛澤東、恩格思、列寧有關話語為框架，批判矛頭直指翦伯贊。(註38)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翦伯贊沒

想到，在接受採訪時批評姚文元「給吳晗同志扣政治帽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68歲的翦伯贊，成為被批鬥的對象。其後，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災難再次降臨到翦伯贊身上。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這罪名需要核實，1968年12月4日，在四人幫指使下，「劉少奇專案組」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翦伯贊專案組」帶領下，來到翦伯贊的家，逼問其有關劉少奇的問題，翦伯贊因「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於12月18日，翦伯贊夫婦服了安眠藥，離開了這個世界。(註39)翦伯贊死前，曾留下簡短的絕命書，最後三句是：「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註40)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為序曲，隨即轉入對「三家村」的口誅筆伐，作為「三家村」之首的鄧拓頓時成了全國上下第一號批鬥目標。1966年5月17日深夜，鄧拓在家中自殺身亡，臨死前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寫給妻子丁一嵐。(註41)對於鄧拓的死，李洪林指出，鄧拓應該不是軟弱之輩，他有清醒頭腦和深刻見解，在遺書中他竟充滿激情地高呼「萬歲」，是為了妻子兒女少受牽連而不得不說的。(註42)

吳晗、翦伯贊、鄧拓都是歷史學家，他們都在政治高壓之下選擇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其他歷史學者的命運又如何？

(一) 陳夢家：在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

中，當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不少。一經打成右派，原來的研究工作就不能繼續進行，不但個人的遭遇悲慘，在學術上造成的損失也很巨大。在楊寬的朋友中，陳夢家的遭遇最是悲慘。文革開始即被迫自殺，享年僅 55 歲。（註 43）

（二）李平心：著有《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初編》，首開唯物史觀研治中國近現代史。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起李平心反感，自 1966 年起，在學術座談會和報刊中，多次表達自己的看法，如〈漫談清官〉、〈論「循吏」、「良吏」、「清官」的歷史評價法〉、〈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問題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問題〉等文。李平心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有兩個標準，即歷史科學標準和政治標準，後者雖然重要，卻不能取代前者。此舉使張春橋、姚文元大為惱火，姚文元自己寫了〈歡迎「破門而出」〉，還指使手下「市委寫作組」成員，在《文匯報》拋出〈平心先生對誰發火〉、〈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直指李平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五一六通知」以後，隨著文革動亂的加劇，對李平心的批判日趨升級，他被指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資本主義復辟的開路先鋒」、「反共成性的反動知識份子」。生性剛直的李平心，不願低頭屈服，在 1966 年 6 月 15 日，以死作為他最後的抗爭。（註 44）

（三）雷海宗：1957 年春，全中國開始整風運動，知識分子開始「鳴」、「放」活動。雷海宗在 4 月間先後參加兩次關於「百家爭鳴」座談會。6 月中，反右派運動開始。8 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會上點名批判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開大學歷史系緊急召開批判雷海宗會議。是年秋，雷海宗被劃為史學界五大右派（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之一。此後，他健康急劇惡化。1962 年 12 月 25 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享年 60 歲。（註 45）

（四）丁則良：是雷海宗在 1930 年代中後期的學生，畢業後留在西南聯大歷史系任教。1945 年抗戰勝利後，赴英國留學。1949 年之後，從英返回清華。丁專攻宋史，在英國又學俄文，研究蘇聯史。1952 年院系調整後，赴東北人民大學任教。1957 年，丁則良被劃為「右派」，訪蘇聯歸來在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沉。（註 46）

（五）楊寬：因從未參與黨派有關的政治組織及活動，在 1951、1952 年間進行「思想改造」和「忠誠老實」運動，沒有被要求要交代過去的歷史。沒想到，有一天忽然接到童書業從山東大學寄來一信，說他和楊組成一反革命集團，敦促楊在運動中向上級坦白交代。楊接信後，一時感到很緊張，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患有「強迫觀念症」的童書業，在一些幹部發動群眾逼問下，承認自己組織反革命集團。楊寬無端受童書業之累，必須面對接下來一場又一場

的政治運動批鬥。(註47)

(六) **鄧廣銘**：宋史專家鄧廣銘，自1966年9月起，或在北大的勞動基地太平庄勞動，或回校住牛棚參加改造。其間，曾一度鬆綁，被允許去中華書局參加標點《宋史》，但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不久又將他押解回校進行批鬥。1969年10月，他和北大大多數教職工一起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1971年5月初，被遣回校。(註48)

(七) **何茲全**：何茲全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致力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能從歷次運動中走過來，是因為他：

在這些運動中，我都努力學習、改造。在運動中，一批批的人倒下去，我都走過來了，很少受衝擊，更沒有倒。原因是，我回國時就定下徹底向共產黨投降，跟著共產黨走，用忠誠換取共產黨寬容的決心。我希望中國知識份子都能如此，換取政治上「樂陶陶」的和諧局面。(註49)

(八) **魏宏運**：1966年6月16日，南開大學歷史系展開批判魏宏運，認定他是黑線上的人。(註50) 1968年11月，南開大學歷史系在主樓二樓舉辦「活人展覽」，首展內容是從魏宏運家裏抄去的精裝本《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金陵春夢》，以

及國民黨出版印有青天白日旗的《總理全集》、《國父全集》等書，鄭天挺等人還需天天到現場「交代罪行」，天津市來參觀者達15-20萬人。(註51)

(九) **陳垣**：1959年1月28日，陳垣加入中國共產黨。陳垣說：「我長期生活在舊社會，大半生是在迂迴曲折的道路上。今天黨給我寶貴的政治生命，我到珍惜這一新的開始。今年我已年近八十，自恨聞道太晚，……我要以有生之年，竭盡能力，為黨的事業，不休不倦地繼續努力。」同年3月12日，陳垣發表〈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表示「十年來的自我改造，是一個革故鼎新的過程，今天作為一個新黨員，更要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好地擔負起黨所交給的任務。」此文發表後，正值全國史學工作者百餘人匯集北京，討論中國歷史提綱。他們得知陳垣入黨，並讀此文，非常感動，由105位史學工作者簽名祝賀，咸認為：「援老入黨，乃史學界之光榮，對共產主義接班人青年，教育甚大。」(註52)

1966年10月1日，陳垣與部分人大常委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觀禮，毛澤東和林彪檢閱150萬遊行大軍，同時登上天安門的還有劉少奇、宋慶齡、董必武、周恩來、鄧小平、陶鑄等。(註53) 與陳寅恪合稱「史學二陳」的陳垣，對中共的態度和陳寅恪完全不同。文革開始不久，陳垣為這史無前例的浩劫憂心忡忡，他死於1971年，直到他死也始終沒能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像那些劫後餘生者，事後畢竟可以得到一個說法。（註54）陳垣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已86歲，且他又很努力適應新政權，積極融入社會主義體制，深得中共上層（如毛澤東、周恩來）賞識，又居高位，故所受衝擊較少。

（十）顧頡剛：中國近代疑古史學代表人，1960年1月30日，顧頡剛日記記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今後工作中必須明確的幾個關於工作方針、路線的問題是：「一、必須明確歷史研究所的根本性質和中心任務。二、加強和鞏固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三、堅持貫徹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研究方向。四、堅持歷史科學領域內兩條道路的鬥爭和黨的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五、堅持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原則，走群眾路線，大搞群眾運動。堅持貫徹總路線，高速度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壯大戰鬥隊伍。」（註55）1961年3月18日，日記中又記說：黨要貫徹「百家爭鳴」方針，鼓勵人多發表意見，說明政治與學術分開，學術論點即有錯誤，不用以前批判方式。但自有俞平伯《紅樓夢》事件，已養成人們的顧慮，展開爭鳴局面殊不易耳。（註56）1963年3月4日，日記中記云：「四日來聽廣播，政治認識提高不少。我輩何幸，生此偉大時代，得有中共之正確指導，自致於世界革命！」（註57）1964年12月25日，又云：「予十五年來，雖深愛黨之成就，然技術至上觀念原封未動，又五七年整風反右

運動以病未參加，故得混過，今日則混不過矣，予決到尹達家請罪。」（註58）

1966年8月12日，云：「今日下午之會，以鬥侯外廬為中心，而其他走資本主義道路之當權派陪之，均戴高紙帽，胸前懸木牌書姓名，共廿八人，以時傳祥為主席團，臺下口號聲震動天地，真是觸及人們靈魂之大革命，予前所未睹也。」（註59）1966年9月7日，「今晚離所時，外院三個女孩，約十一、二歲，想為職工子女，向予拋石子，擲後腦。予告以『要文鬥，不要武鬥』，渠等曰：『你這個老頭兒特別壞，要武鬥！』予遂聽其所為，急步出門。看街上所貼傳單，有假紅衛兵自京到津，實行武鬥，有被毆死者，予已到當死之年齡，又何惜此生命，特尚未達改造之目的地為恨耳。」（註60）1966年12月31日，「檢舊出版物，……正在觀覽，靜秋（顧頡剛妻）突來搶奪，予以一手掩之，彼乃用嘴咬，卒被彼奪去，先撕散之，復投爐中，此一史料遂滅跡矣。予太有歷史觀念，靜秋太無歷史觀念，以『除四舊』為名，恨不得將予一生積聚全付焚如。夫妻間之矛盾若是，家庭生活可謂苦矣。」（註61）比起被批判的其他歷史學家，顧頡剛算是比較幸運的，但他還是得面對整個大環境帶給他的衝擊。

透過顧頡剛的日記，我們可以知道周一良、俞平伯、徐旭生、陳寅恪、鄭天挺、向達、侯外廬、賀昌群等人的不幸遭遇。

1. 北大歷史系副主任周一良，其曾祖

為兩江總督周馥，其祖為財政部總長周學熙，其父為天津市副市長周叔弢，均為官僚資本家，開設有啟新洋灰公司等工廠。中共建國初期，周一良表示積極，入黨，以為黨不講階級鬥爭。文革時，北大紅衛兵抄其家，顧頡剛說：「黨員招牌固不能掩其本質也」。(註62)

2. 俞平伯家被二中紅衛兵所抄，取其母之「壽衣」令其穿上，而平伯夫婦跪於其前，藉以表示封建家族之醜態。

3. 考古所徐旭生，年七十九矣，被迫令跪在凳上，及暈而倒地，則曰：「令他死！」雖未死而亦酷矣！(註63)

4. 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向得陶鑄保護，其家亦被紅衛兵所抄，「以其太特殊化也」！

5. 侯外廬之家被歷史所紅衛兵所封，只好住門房，電影學院學生撕封條，毀其古物，復搜括其錢財，至於無吃飯之資，只得請「文革」小組予以調濟。(註64)

6. 鄭天挺在南開，受批判甚劇，且令其「穿麻衣，拄哭喪棒，示為封建社會之孝子賢孫。」(註65)

7. 向覺明(達)治中西交通史，其死據說在1966年「運動中判往十三陵勞動，體力不勝，帶病歸，竟以不起。」(註66)

8. 1966年9月17日，顧頡剛日記記說：「年輕者皆作重勞動，而年老者侯外廬專掃廁所，賀昌群只掃二樓北一角地，故予之任務遂重。然必須如此勞動始能改

變剝削階級之思想與積習，故亦安之若素。」(註67)

「文化大革命」是恐怖可怕的歲月，全中國成為「赤色恐怖」世界，也可說是「大革文化命」的時代。(註68)昔日之士，為四民之首，而今日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對象。(註69)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說，那個時候史學界就是有一批「左」得可惡的人，緊跟上邊，領會上邊的意圖，掄起棍子打人，動不動就給人扣帽子，好像就只有自己進步似的。這樣的人中央裏有，地方也有，高校裏有，中國科學院學部也有。(註70)黎澍和劉大年被說是學霸，是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丁守和自己因為是《歷史研究》的「大總管」，所以要陪鬥。他曾帶着紙糊的高帽，掛著黑幫牌子，跟在劉大年、黎澍後面示眾，在近史所和考古所大門前展覽，讓來往行人觀看，可謂毫無尊嚴可言，此為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文明。(註71)

四、毛澤東的角色問題

在探討「歷史」和中共歷來「政治」運動的關係時，毛澤東個人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共建國以來發生的歷次批判運動，幾乎都與毛澤東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毛澤東喜讀史書，有深厚的歷史知識，對歷史也有其獨特感悟。他的歷史觀，充滿反傳統意識，深深影響著中共建國以來一

系列的政治運動。(註72) 歷史學者吳晗、翦伯贊、范文瀾、陳垣等人，和毛均有一定的「學術交誼」，但當「史學」遇到強勢「政治」壓力時，「史學」毫無招架之力。

1940年，范文瀾在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支持下，范文瀾指導中國歷史研究室的史學工作者，集合編撰《中國通史簡編》，後因效果欠佳，范決定自己獨立完成此項工作。1941年，第1卷完稿，在延安出版。毛澤東在該書出版後立即閱讀，讀後非常滿意，還請范文瀾吃飯，認為這是：

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註73)

據高華研究，毛澤東在公開場合與各方人士會晤中，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待人誠懇、得體，贏得各界人士對他普遍的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用、桀驁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眦必報，對黨內同僚峭刻嘲諷。(註74) 1954年秋，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一次與吳晗坐在一起，談話時說起《資治通鑑》，毛說起舊本沒有標點，不分段

落，今人讀之不便，應找人整理出一個用標點、分段落的本子，以廣流傳。又講到讀歷史應有一部歷史地圖以資對照。吳晗向毛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鑑》同時，可以把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加以改造，以適應時代需要。毛澤東同意吳晗建議，就將這兩件事交由吳晗負責辦理。(註75)

毛澤東不但喜歡讀歷史，對於某些歷史學者寫出來的著作，常藉機加以「指導」，有時也會安排類似私人交誼活動。如在1957年夏天，毛澤東就邀請過去曾在長沙第一師範共事過的周谷城，到中南海一起游泳，討論《漢書》趙充國主張西北屯田一段。(註76) 1963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學部委員會會議，毛澤東問吳晗書寫得怎麼樣了？吳晗受此鼓勵，在1964年春利用病後半休時間，對1954年版《朱元璋傳》進行了修改，重新出版，得到毛的好評。(註77)

毛澤東和歷史學者的交往，如果僅限於「歷史問題的討論」，倒可看出他的「禮賢下士」風采，但毛的這些作為是有其背後政治目的的。文革前，批俞平伯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隨後又引出對胡適的批判。(註78) 而文革的發動，更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由康生、陳伯達、江青直接指揮，姚文元、戚本禹等「政治打手」，頂著「文化大革命」招牌，首先對歷史學界展開攻擊，史學工作者全被打倒，史學慘遭「滅頂之災」。(註79)

在毛澤東統治之下，毛的畫像是神聖不

可侵犯的，甚至報紙上刊印的毛澤東畫像也是不可隨便損毀。毛的「最高指示」是神聖的，成了唯一的言論、行動的準則。無論宣布什麼通知，作出什麼決定，召開大、小會議，首先要宣讀「最高指示」。(註80)除了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的言論與思想，也深深烙入許多歷史學者的心靈中。

以顧頡剛為例：1966年8月3日，顧頡剛日記記云：「靜秋苦勸予暫置業務，專心政治學習，以符時代要求。余聽其言，將《尚書》稿盡置內書室，至客廳書桌則專置《毛選》、《毛主席語錄》及報紙《學習資料》等，庶幾心不旁鶩。」(註81)1966年12月1日，「今夜夢見毛主席，相對長談，足徵余求進之心未衰也。」(註82)1967年3月10日，「《毛主席語錄》在華盛頓暢銷，在英亦供不應求，西方工人之覺悟必能推動世界革命。毛主席的書真成了全世界人民的精神原子彈。此無他，有正確之立場，有對敵我雙方之精密之分析，有革命實踐之勇氣，有援外之物質與精神，方能發生此絕大效果也。」(註83)1967年6月8日，「予夢見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夢特長，毛主席來我家，溫語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象，但足徵余參加運動十個月，對毛澤東思想已漸能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彌可喜也！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自嘆其衰，余今體已就衰而志則甚壯，是則聞道雖晚，當不致朝聞夕死，不措之於實用也。」(註84)1968年9月30日，「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

但改造了我國每一個人的面貌和精神，而且喚醒了全世界的青年，推動了全世界的革命，成為一個世界史上劃時代的運動。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是不會有這樣的成果的。」(註85)

顧頡剛一度曾是中國國民黨員，受過蔣介石接見，與國民黨文化和教育部門許多高官關係良好。1949年大變局中，他選擇留在中國，顧頡剛日記中大肆頌揚毛，與其說毛澤東贏得了「天下歸心」，不如說毛用暴政讓大部分人不得不過著「口是心非」的、雙重人格的生活。(註86)

郭沫若的角色很值得我們留意，他可以說是中國文革中僅存的文化大家，其它同時代的文化人幾乎都去了牛棚或蹲監獄，或命歸黃泉，唯有他依然風風光光做著中國文化界領袖和旗幟。(註87)1944年3月，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總結明末農民領袖李自成「起義」失敗的教訓，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有極大的教育意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毛並鼓勵郭沫若說：「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絕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註88)〈甲申三百年祭〉描寫的雖然是李自成，其實真正歌頌的是毛澤東。中共建國後，郭氏寫出更多歌頌毛澤東、史達林，甚至江青的詩文，他寫的每個「大人物」，都令人感到是跪在地上寫的。(註89)1966年10月1日，郭沫若應邀參加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

閱 150 萬遊行隊伍的活動。(註90)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史學批判發動的一個重要條件。由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全中國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種威望隨形勢發展逐漸被神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歷史問題的一些論斷，甚至個別談話，都被當成不可動搖的真理，被史學界遵從，形成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所謂「遵命史學」、「跟風史學」。毛本人有時利用自己的這種影響力對學術界發號施令，同時也有人借助他的這種影響發動批判鬥爭。(註91)統治者希望其統治下的人，要表現「絕對的忠誠」，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分析，毛澤東至尊地位的本質有二：一是造反頭子，另一是現代版的皇帝。(註92)毛澤東喜歡在歷史裏尋求「同志」，(註93)緣於他對「歷史」的癖好，更是為了借由「歷史」來進行他的「政治」運動。

五、結論

俄國大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著魔者》(*The Possessed*)書中人物席格列夫(Shigalev)說：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是，「起於無限的自由，而結束於無限的專制。」(註94)當我們談到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時發現：由於強大的政治壓力，使得「歷史」變成「政治」運動(鬥爭)的工具，「歷史」原本應

該是一門具有公正客觀化的嚴肅學科，但在殘酷鬥爭的環境底下，也只能成為「政治」的婢女。

中國共產黨對於「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毛澤東個人。毛不僅好讀史書，也和一些歷史學者(如范文瀾、吳晗、翦伯贊、周谷城等)有所交往，但他更喜歡利用「歷史」來做政治鬥爭的工具。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因此，這種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中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註95)不管是中國共產黨，或是毛澤東，對於歷史的「興趣」，也可以用這個說法來理解，簡單地說，就是「史為今用」。

在一個表面上極榮譽的名稱下，各種令人憎惡的事都有可能發生。例如在歐洲，有數不清的屠殺、迫害，都曾以「基督」的名義，被視為是神聖的；許多虔誠的日本人心目中，民族的罪行是可以用「佛」的名義得到寬恕。(註96)缺乏對歷史的真誠認知，很容易導致政治上不公義泛濫、肆意橫行。(註97)在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宣傳」和「恐怖」常是一體兩面，有時候這些國家，也會以「教化」來代替「宣傳」，此時「教化」不可避免地與「恐怖」相伴，「恐怖」是其統治形式的本質，(註98)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就具有這樣的特質。

在任何政權之下，歷史學者都應該認真於學術追求，否則就是歷史學者的失職（失責）。歷史學原本應該是一門「批判的學問」，在面對歷史知識體系面臨崩潰的情況下，歷史學家應該嘗試走出一種具有說服力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書寫）方式。（註99）在學術與氣節的蹺蹺板上，（註100）如何保持適當的平衡，是一良心與骨氣的抉擇。

極權主義對人類永遠有其蠱惑力與吸引力，（註101）歷史常會被政治人物拿來濫用，唯有透過嚴謹的歷史研究，才可以使歷史學成為一種解毒劑。由於歷史知識的有效性受到質疑，使得歷史學需要捍衛；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學科，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在認識論上，都要能不斷的提升，（註102）以避免「歷史」成為「政治」的工具，甚至被「邪惡的操縱」（sinister manipulation）。

歷史可以為現實服務，現實也存在於歷史中，（註103）史學不能擺脫它所處的時代，並滲透著當今的各種現實問題，這便形成對歷史的建構和解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歷史雖向歷史學者求助，但卻遭到他們的迴避與拒絕」；（註104）德國歷史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外在表象並不是我們歷史研究必須揭示的最終事物，表象之下的歷史事實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註105）這也是歷史研究的旨趣。

總之，歷史學者應特立獨行，甘於寂寞，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不攀附權勢，不熱中名利，勇於表達一己之見，充當

弱勢者喉舌，並保持批判意識，反對崇拜偶像，面對金錢和權力（權威），不屈服於誘惑，且要能說真話。（註106）我們可以依此標準來衡量，評判他是否是位合格的歷史學者；但是，對於中共統治下的歷史研究者，我們或許應該把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一起納入考慮，才能對他們做出比較公正合理的評價。

【註釋】

1. 章開沅，〈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鴻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6。
2. 耶爾恩·呂森，〈序〉，收入F. H. 布萊德雷（Bradley）著，何兆武、張麗豔譯，《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i。
3. 羅旺·卡立克（Rowan callick）著，盧意寧譯，《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Party Time: Who Runs China and How*）》（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158。
4. 專研中國上古史的王玉哲，有一次與胡厚宣閒談，王問胡：「為什麼我們在臺灣的一些老同學都是著作等身，都有成本大套的著作出現，而我們的成績顯得可憐了？」胡回答說：「我們這麼多年來天天搞運動，在這方面他們又望塵莫及了！」這雖是笑話，卻也反映了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王玉哲，〈我和中國上古史研究〉，收入張世林編，《家學與師承——著名學者談治學門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70-370。
5. 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4年），頁369。

6. Raymond Aron 著，賴建誠譯，《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年），譯序，頁 viii，及引言，頁 xxvi。
7. 張海鵬，〈當代中國歷史科學鳥瞰〉，收入張海鵬主編，《中國歷史學 30 年（1978-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1。
8. 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4。
9. 胡平，《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美國加州：博大出版社，2005年），頁 373。
10. 劉耿生，〈序言：清官的「罪惡」〉，收入劉耿生，《海瑞罷官與文革》（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0年），頁 9。
11. 邁克爾·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著，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頁 35。
12. 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著，倪復生譯，《歷史書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封面折頁。
13. 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轉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372。
14. 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到「新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26。
15. 王學典，〈翦伯贊：前「文革」時期史學界理論探索的先驅〉，收入王學典編，《史學理念》（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頁 1。
16.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政治含義的「史學批判」，具有豐富的內涵，包括：1949-1951 年史學界的政治學習、1951 年的武訓和《武訓傳》批判、1951-1952 年史學界的思想改造運動、1954-1955 年史學界的胡適思想批判、1957 年史學界的反右派鬥爭、1958 年的「史學革命」、1960 年對尚鉞的批判、1963-1965 年對劉節、羅爾綱、周谷城、孫祚民等之批判和「文革」爆發前後對吳晗、翦伯贊等一系列批判的總稱。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1-2。
17. 史學批判之所以發生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與當時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背景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批判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特定產物。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4、13。
18. 在這場名為「史學革命」的政治運動中，史學批判既是史學革命的手段，又是史學革命的目的之一，最後以至於為批判而批判，「史學革命」就是史學批判，史學批判就是「史學革命」。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3。
19.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理論與方法·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封面折頁。
20. 齊鵬飛、楊鳳城主編，《當代中國編年史：1949.10-2004.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 154-156；王繼權、童煒鋼編，《郭沫若年譜》（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下冊，頁 121。
21. 到 1956 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時，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天翻地覆變化。所有制性質變了，暗藏的特務和反革命消失了，地主、資本家、富農從剝削者轉變為勞動者，國內的敵對勢力基本不存，就是大多數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也對共產黨心悅誠服。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 3、213。
22. 到 1956 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的歷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歷史確實提供了一個機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探索。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

- 銳意見，使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 1957 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由於反右派鬥爭擴大，把一批知識分子和黨內幹部劃為「右派分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7 年〉，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4/4416036.html>（2017/10/3 點閱）；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 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9。
23. 錢理群，〈「何時能因鑒而止」？——讀王林書《詩鑒》〉、〈我的「一九五七年學」研究（代跋）〉，收入錢理群，〈拒絕遺忘：「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71、491。
24.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 年 2 版），頁 8。
25. 這場大批判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和手段，與解決學術問題、思想問題毫無關係。首先，它是按照政治預謀而發動，並且在預謀者的掌控下向前發展，最終也達到預設的政治目的。它實質上是政治對學術的批判、權力對真理的批判，是要消除學術對極「左」政治的束縛、真理對專制權力的制約。廣大學者雖然不是最終的受難者，但卻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這種肆意對歷史的濫用，從對《武訓傳》的批判開始。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該文經毛澤東修改審定，文章中指稱《武訓傳》「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指對武訓那樣的人）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7 月 23 日，《人民日報》又發表〈武訓歷史調查記〉，《武訓傳》開始遭受全國性批判，此後該片在批鬥會上被多次當反面教材。杜學霞著：《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276、330；〈武訓傳〉，網址：<http://baike.sogou.com/v765698.htm>（2017/10/12 點閱）。
26.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臺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頁 346、350。
27. 陳曉林譯，〈《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頁 72。
28. 周武，〈以史經世：史學良知的當代之旅——陳旭麓傳〉，收入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年），頁 254-255。
29. 「三家村」，即「三家村札記」，原是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1961 年 9 月以後開闢的雜文專欄，由當時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委員、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負責撰文，以「吳南星」為共同筆名。此專欄一改過去「大躍進」時空發議論、高喊口號的毛病，發表一些結合理論與實際及總結經驗的文章，頗得讀者好評，但後來卻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的罪名。在此時，中國社科院撤銷，歷史研究所停辦，所有大學停課，所有教授關進牛棚。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330；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頁 317；霞飛，〈《三家村札記》的由來〉，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72/85037/85040/6585427.html>（2017/10/12 點閱）。
30. 參加史學批判的有所謂的「職業批判家」的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林杰等以及後來作為御用寫作班子的「羅思鼎」、「梁效」、「唐曉文」等。他們或盲目參加批判而追隨政治潮流，或利用批判運動以攫取個人私利。王學典，〈翦伯贊：前「文革」時期史學界理論探索的先驅〉，翦伯贊著，王學典編，〈史學理念〉，頁 1；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349。
31. 王繼權、童焯綱編，〈《郭沫若年譜》〉，下冊，

- 頁 265。
32. 此後，歷史被踐踏，被濫用，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學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學習儒法鬥爭，批《水滸》，批宋江，歷史學成為奪權的一種工具。戴逸，〈世紀之交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收入中國歷史學會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青年學者論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2-13。
 33.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頁437。
 34. 何茲全，《何茲全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愛國一書生〉，第6卷，頁2969。
 35. 左玉河、王瑞芳訪談整理，〈丁守和先生訪談錄〉，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50-51。
 36. 岳南，〈吳晗之死——敗於大人陰謀之下 毀於政治僵屍之手〉，網址：<http://hx.cnd.org/2016/12/04/%E5%B2%B3%E5%8D%97%E5%BC%9A%E5%90%B4%E6%99%97%E4%B9%8B%E6%AD%BB%E5%BC%9A%E8%B4%A5%E4%BA%8E%E5%A4%A7%E4%BA%BA%E9%98%B4%E8%B0%8B%E4%B9%8B%E4%B8%8B-%E6%AF%81%E4%BA%8E%E6%94%BF%E6%B2%BB%E5%83%B5%E5%B0%B8/>（2017/9/27 點閱）。
 37. 馬紫梅（M. Mazur）著，曾越麟等譯校，《時代之子吳晗》（*A Man of His Times: Wu Han, the Historian*）（臺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86。
 38. 戚本禹說：「歷史研究從來是思想鬥爭非常激烈的一個領域。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為了麻痺勞動人民的反抗意志，從來不放鬆對這個領域的控制。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歷史觀點是不會自動地從歷史研究的領域裡撤走的。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高高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勇敢地去佔領和鞏固歷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切陣地。」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15；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網址：<http://marxistphilosophy.org/Hongqi/65/196513-14.htm>（2017/9/26 點閱）。
 39. 翦伯贊與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並稱為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新史學家翦伯贊》一書作者張傳璽，從中央級的報紙雜誌，以及上海、北京幾個「寫作組」、「大批判組」的文章，歸納出翦伯贊有11條罪狀：1. 蔣家王朝的忠實走狗，反共老手；2. 破壞偉大的土改運動；3. 漏網的資產階級大右派；4. 頑固地反對史學革命；5. 瘋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6. 借古諷今，反黨反社會主義；7. 推行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8. 結黨營私，搞資本主義復辟；9. 宣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挑撥民族關係；10. 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1. 畏罪自殺，對抗到底，自絕於人民。張傳璽認為，這些罪狀都毫無根據，可笑的是最後一條，逼死了人，還賊喊抓賊。〈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為何會自殺？〉，網址：<http://www.lishiquwen.com/news/18355.html>（2017/9/26 點閱）；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頁335-336；〈著名史學家翦伯贊是怎樣死的〉，網址：<http://www.lishiquwen.com/news/65735.html>（2017/10/12 點閱）。
 40. 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頁332。
 41. 鄧拓最後向組織解釋自己為甚麼要去死的原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

- 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我在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胡平，〈鄧拓之死——文革中自殺現象案例研究〉，網址：<http://www.huping.net/works/canine/canine-7-2.htm>（2017/9/27 點閱）。
42.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頁 110。所謂「三家村」的冤獄和鄧拓、吳晗同志的犧牲，不過是一場歷史大悲劇的序幕而已；值得我們感情激動的，並不是這場悲劇的序幕，而是我國一切抱有宏圖大志的歷史科學家踴躍前驅，去尋找和發現我們這個 9 億人口的大國為甚麼產生這場歷史大悲劇的真正原因。廖沫沙，〈這不過是歷史大悲劇的序幕——憶鄧拓〉代序，收入氏著，《廖沫沙全集》，第 2 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 年），頁 254。
43.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頁 230-231。
44. 1966 年 5 月 4-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職務。16 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搞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胡逢祥，〈不屈的史魂——李平心傳〉，收入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頁 80-8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6 年〉，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4/4416081.html>（2017/10/12 點閱）。
45. 1958 年 2 月，反右運動進入定案處理階段，雷海宗因兩個問題遭受批判：一是認為 1895 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停滯，二是否定中國有奴隸制。〈雷海宗〉，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6%B5%B7%E5%AE%97>（2017/9/26 點閱）；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41。
46. 〈雷海宗〉，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6%B5%B7%E5%AE%97>（2017/9/26 點閱）。
47. 楊寬、童書業同樣接受顧頡剛指導，兩人合作研究春秋戰國史，童書業撰有《春秋史》，楊寬撰有《戰國史》、《西周史》、《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國上古史導論》等書。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頁 215；〈楊寬〉，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5%AE%BD/12469>（2017/10/2 點閱）。
48. 鄧廣銘，《鄧廣銘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2 版），〈自傳〉，頁 8-9。
49. 文革期間，有部分歷史學家被邀參與標點廿四史，能夠暫時避開政治運動，是一極大的幸事。何茲全自己提到，他離開學校，到中華書局參與標點廿四史的心境：「離開師大，簡直和逃兵一樣。早晨吃過早點很早就往中華奔，下午下班回家，過牛門都不敢抬頭，溜溜地回家。眼中的師大，亂哄哄一片。彭德懷、彭真

- 等都是在這時期被師大揪到大操場批鬥的。我都沒有看見。對師大的革命不聞不問，大字報也不敢看。」但中華書局也不是完全的避風港，那裏的年輕革命群眾對到中華標點廿四史的人，也有看法，他們懷疑這些牛鬼蛇神是來這裏避風頭，為此孫達人還找過戚本禹，向中華群眾宣佈，凡到中華參加標點廿四史的人都不是牛鬼蛇神。何茲全，《何茲全文集》，〈愛國一書生〉，第6卷，頁2907、2976-2977。
50. 鄭天挺也未能躲過被鬥爭，鬥爭過後，他被勒令去拔草，因手沒有勁，就用牙去咬。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57-58、60。
 51.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70。
 52. 1959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一書，選編在京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後所寫的感想文章20篇，陳垣文章入選，並以其文標題為書名。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鄭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下冊，頁737、740、747。
 53.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鄭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冊，頁845。
 54. 1970年1月，陳垣曾向其助手劉乃和多次說：「這樣好的黨，現在為什麼不管了？這是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黨的優良傳統哪裡去了？不明白！」啟功，《啟功全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卷——啟功口述歷史，頁111；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鄭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冊，頁853。
 55.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9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21。
 56.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9卷，頁230。
 57.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9卷，頁639。
 58.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184。
 59.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09。
 60.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27。
 61.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85。
 62. 1966年9月21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34。
 63. 1966年10月3日及5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41-542。
 64. 1966年10月22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49。
 65. 1966年10月31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54。
 66. 1967年4月11日，顧頡剛日記中記云：「厚宣謂予，昨在汽車中遇王伯祥，詢其近況，答以『待死』。老年之苦，至於如是。予積極性尚存，終當通讀馬列主義，不愧為今世人也。」1967年2月14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620、653。
 67. 1969年2月，賀昌群給歷史所的信中說：「自上月24、25日來所參加學習班，因受寒冷，發高燒近40度，心電圖指示，心房纖維顫動，心律不整，心機能衰退，臥病至今。我今後恐不能按時上班，如果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我還活著，我願誠懇地老老實實地做群眾的小學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賀昌群死於1973年11月1日，文化大革命仍持續中。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32；賀齡華執筆，〈賀昌群（藏云）生平及著述年表〉，收入賀昌群，《賀昌群文集》，第3卷——文論及其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678。
 68. 何茲全，《何茲全文集》，〈愛國一書生〉，第6卷，頁2968、2971。
 69. 1967年8月23日顧頡剛日記。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729。
 70. 丁守和形容說，許多高等院校的「歷史系師生開會，慢慢都變臉了！」左玉河、王瑞芳訪談整理，〈丁守和先生訪談錄〉，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頁47；何茲全，《何茲全文集》，〈愛國一書生〉，第6卷，頁2971。

71. 丁守和在 1963 年出版《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被康生批示為「利用歷史研究反黨」，是大毒草，文革中自然難逃被鬥命運。左玉河、王瑞芳訪談整理，〈丁守和先生訪談錄〉，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頁 55、58。
72. 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 21。
73. 董榮正主編，《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上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32-335。
74. 魅力（charisma）與領導人的氣質有關，政治領袖的魅力常隱含著致命的殺傷力。從來沒任何一個時代像 20 世紀一樣，出現這麼多富有領袖魅力的領導人物，可是史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澤東四人，對人類卻造成空前的大傷害。真正重要的是不是領袖魅力，而是領導人帶領大家邁進的方向是否正確。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年），前言，頁 xiii；彼得·杜拉克著，馬齊里格（Joseph A. Maciariello）編，《每日遇見杜拉克：世紀管理大師 366 篇智慧精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11 年 2 版），頁 66。
75. 1955 年，吳晗遵照毛澤東指示，組織力量標點《資治通鑑》和《續資治通鑑》。同時，也依毛指示，邀請上海復旦大學、國家測繪總局、地圖出版社、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以及各方專家，齊聚北京，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為日後出版《中國歷史地圖集》打下基礎。其後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8 冊，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最優秀者。葛劍雄，〈悠悠長水 求索時空——譚其驤傳〉，收入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頁 295、340-341；張友漁、薛子正，〈深切懷念吳晗同志〉及羅爾綱，〈懷吳晗〉，收入吳晗著，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 1 卷——歷史卷（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26。
76. 「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百花齊放」是因戲曲會議而提出，「百家爭鳴」是歷史研究首先提出，就後者言，1953 年，中宣部約請翦伯贊等歷史學家合撰《中國歷史概要》，在請示毛澤東如何對待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時，毛回答「實行百家爭鳴」。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百花齊放」一旦顯露了知識分子對共黨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態度，毛澤東便以 1957 年 6 月開始的反右運動來懲治頑強的知識分子。孫寶義主編，《毛澤東讀書生涯》（臺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3 年），頁 105；齊鵬飛、楊鳳城主編，《當代中國編年史：1949.10-2004.10》，頁 164；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China: A New History*）（臺北：正中書局，1994 年），頁 418。
77. 張友漁、薛子正，〈深切懷念吳晗同志〉，收入吳晗著，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 1 卷——歷史卷（1），頁 6。
78. 何茲全，《何茲全文集》，〈愛國一書生〉，第 6 卷，頁 2919。
79. 張劍平，《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206、218。
80.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頁 324。
81. 1966 年 6 月 10 日，田漢日記云：「回到家裏來竟有幾十天沒有寫日記了。但每天從床上聽廣播起到看報、聽報告，得了許多深刻學習，而最使自己高興的是把主席選集全四卷較精地通讀一遍了。我若早這樣讀主席的書聽主席的話按主席的指示辦事，何至犯這麼許多錯誤？……在主席著作的光照下來檢查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錯誤吧。又要檢查過去，又要向前看，爭取做主席的學生吧。主席的思想是巨

- 大的燈塔，它能使迷途的人得到正確的方向，落後的人獲得前進的勇氣，為什麼我的困難就不能從主席著作得到解救？」1966年6月10日，田漢在看了大字報後，寫了如下詩：「看了大字報，百感來頭腦。入黨已多年，改造苦不早。脫離工農兵，卻跟地富跑。陷溺漸漸深，鬚髮垂垂老。猶期勵晚節，風雪梅花好。勤讀主席書，多聞主席道。脫胎換肌骨，健步迎新曉。莫負黨教育，凋落隨百草！」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05；田漢，《田漢全集：第20卷——書信、日記、難中自述》（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467-468、471。
82.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70。
 83.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636。
 84.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688。
 85. 1969年7月31日，顧頡剛在看了他的孩子批評他的信後，很興奮地在日記中記說：「我知道只要念念不忘緊跟著毛主席和無產階級走，我還可以在新中國的大好時代裡不做一個廢物。」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33、125。
 86. 余杰，〈顧頡剛何以變成一條蟲？——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網址：<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nan/wenyitiandi-cite/yj2-08062013103630.html>（2017/10/2 點閱）。
 87. 郭沫若深得毛澤東賞識與信任，在那狂熱時代，可謂意氣風發。但他也無法保住自己兒子郭世英的生命，郭世英是郭六個兒子中最有才華的，1968年4月19日早晨，被非法綁架關押迫害致死，年僅26歲。〈文革郭沫若對兒子見死不救：我也為了中國好〉，網址：<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40116/18292102.html>（2017/10/2 點閱）。
 88. 董榮正主編，《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上冊，頁341-354。
 89. 1959年1月3日，郭沫若發表〈學習毛主席〉。1963年1月1日，郭沫若發表〈滿江紅——1963年元旦書懷〉，歌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郭沫若歌頌史達林、江青、毛澤東的詩如下：「我要向你高呼萬歲/史達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我向你高呼萬歲——史達林元帥〉）；「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的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司馬璐編著，《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頁160-161、175、325；〈建國後大文豪郭沫若為何變得「奴顏媚骨」？（1）〉，網址：<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21107/17515324.html>（2017/10/2 點閱）。
 90. 王繼權、童焯鋼編，《郭沫若年譜》，下冊，頁418。
 91. 杜學霞，《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頁22。
 92.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頁420、441。
 93. 陳晉，《毛澤東之魂》（香港：名流文化出版，1997年），頁174。
 94. 陳曉林譯，《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頁91。
 95. 貝奈戴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著，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slie）英譯，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History:*

-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年), 頁2。
96. 羅素(B. Russell)著,何兆武、肖蕪、張文杰譯,《論歷史》(*Understanding History*)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7。
97. 列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羅格·文斯(Roger Wines)編,易蘭譯,《世界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
98.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頁365-367。
99. 永原慶二著,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38。
100. 陳遠在《負傷的知識人——民國人物評說》中有篇〈在學術與氣節的蹣跚板上〉,討論馮友蘭的文章。陳遠,《負傷的知識人——民國人物評說》(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年),頁115-122。
101. 陳曉林,〈「自由四論」與人文心靈〉,收入 Isaiah Berlim 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 頁 xiii。
102. 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到「新史學」》,頁207;理查德·艾文思(Richard j. Evans)著,張仲民、潘瑋琳、章可譯,《捍衛歷史》(*In Defence Of History*)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56-257。
103. 陳勇,〈歷史,你在那裏?〉,收入王希、姚平主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98。
104. 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到「新史學」》,頁53、55。
105. 列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羅格·文斯(Roger Wines)編,易蘭譯,《世界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4。
106.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年),頁125-126、220。